

DOI: 10.19411/j.cnki.1007-7030.2020.02.002

#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新时代之思

——兼论当下信仰危机与价值虚无的化解及应对

唐忠宝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近代以来,伴随着“上帝之死”及其引发的价值颠覆,信仰危机由此进入一个“商品拜物教”的新阶段。信仰危机与现代性的历程密切相关,现代性的“两面性”导致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以意识形态的最高客体形式掌控信仰世界的“内核”。价值重建后的信仰必须深刻把握理想与现实的历史辩证性、实践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现实运动,又可以作为一种远大理想;既是一个社会阶段,也是一种价值目标。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对于当下应对价值虚无与信仰危机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关键词:**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仰危机;价值虚无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20)02-0016-09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思想观念日益多样,社会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社会思潮纷繁复杂,由此导致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危机,陷入了以“佛系”“丧”“空心病”为表象的价值虚无化与信仰世俗化的精神困境。现代性语境下的信仰问题,经由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率先洞察并引起人们关注,但客观地说,无论是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还是海德格尔和萨特,均不如马克思深刻和合乎历史规律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坚持这一根本文化制度,筑牢全体人民共同思想基础更是必须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幸的是,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存在着严重的误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信仰危机作理论溯源,进而正本清源地澄清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误解,值得我们再次深入思考。

## 一、信仰危机的理论溯源:世俗化与“去神圣化”

现代性语境下的信仰问题探讨,要从传统形而上学对世界的终极追问及其所面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价值虚无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击与应对研究”(16CKS040)

**作者简介:** 唐忠宝,哲学博士,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党的建设。

临的挑战说起。因世俗化导致超感性世界的崩塌，进而引发“去神圣化”与终极意义的缺失，现代人的信仰问题愈发变得突出和严峻。

### （一）现代化与“去神圣化”

在传统形而上学世界里，因为对自身和世界的终极追问，使人们构筑起一套又一套超验世界的理解框架，对现实的社会秩序、生活秩序、道德秩序产生规范性作用，并为人的生存提供意义保障。然而，自近代以来，现代化一方面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并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与此同时，马克斯·韦伯笔下的“祛魅”问题也愈发凸显，因为现代化、世俗化就意味着人们往往更加关注经验世界，而对超验维度则走向外化。这即是现代化带来的世俗化及其“去神圣化”“去崇高化”“去超验化”问题。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现实表征和本质规定性的“现代性”，是导致发生世俗化及其“去神圣化”的内在理论逻辑。从现实情况来看，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理性、启蒙、科学技术、资本逻辑等不断地冲击和消解着这些神圣与崇高的超验秩序。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度追逐权力、资本的问题日益突出，重物质利益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商品拜物教走进人们的精神深处。

尼采对现代性的“两面性”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即上帝之死及其引发的最高价值的“退场”。上帝的“退场”意味着价值无序、道德伦理失范、悲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直接撞击市民社会中人的心灵。而在尼采之前，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便率先洞察到孤独的、非理性的个人存在的意义问题，并对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理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看来，非理性的个人情感体验，哪怕是焦虑、忧郁、畏惧、厌烦、绝望等悲观的情绪也都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存在，因为世界绝不只是纯粹的理性完全能够解释的。在黑格尔笔下的“亦此亦彼”“或此或彼”，在克尔凯郭尔这里则表现为“非此即彼”，而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往往认为，确实后者更加符合现实因而更能够代表人生哲学。

对于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马克思的论述主要基于两个视角。一方面，马克思看到了现代化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变化，尤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有过十分详尽的考察和论述，无论是机器大工业的生产，还是铁路通行、电报使用、河川同行以及人口的爆发式增长，这在以往的时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同尼采一样，深刻地洞察到了现代性带来的“去崇高化”和“去神圣化”，并比尼采的论证更进一步。在马克思看来，导致价值虚无化的最根本的现实逻辑是资本，在资本面前，“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sup>①</sup>表面上看，资产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种纯粹性，在某种意义上带来了认知的理性化、社会的进步以及阶层的平等，但实际上，被资本掩盖着的背后一方面是劳动者遭遇的新形式的奴役和压榨，另一方面正是市场化所带来的价值无序、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信仰缺失的精神危机。

## (二) 经验与超验的视域差异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信仰之所以为信仰，其逻辑前提是将世界二元划分为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必须且只有指向后者的意义世界，方为信仰之域，譬如基督徒心目中的天国、佛教徒心目中的净土、穆斯林心目中的天园等等。如果基于这一标准，那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由于重“易”和“现世”，基因中对绝对恒定的、彼岸世界的终极信仰确实相对较弱。但问题是，此岸世界是否具备终极意义的可能？当下世界能否寻找到终极关怀？关注当下与追求长远能否统一起来？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国家社会的发展能否结合起来？无疑，上述这些问题，中国的先贤们早就作出过精辟和深刻的回答。其基本意涵是既要格物、致知，还要修身、齐家，更要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心目中的终极意义，最经典的表述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换句话说，西方人往往更为关注宗教信仰，而中国人似乎更习惯于诉诸人生信仰、政治信仰。有人将中西方信仰问题的不同关注点归结为道德意义与宗教意义的差异，即认为中国采用以道德替代宗教的路径，甚至不少人从信仰、超越、终极关怀等层面来阐述中国儒家文化的宗教性意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思想还是以“人”为中心的，即使被阐述成具有宗教性，也只能勉强算是一种“入世”的、“现世”的人文性宗教。

众所周知，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文明以两希文明为源头，即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前者以柏拉图主义为代表，将世界的终极意义指向超验的理念；后者以基督教文明为代表，其永恒性、终极性则体现为天国世界、极乐世界。西方文明的这种二元世界划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哲学理念早已根深蒂固。如此说来，既然并无经验与超验的划分，那么尼采口中的“超感性世界的崩塌”与“最高价值的废除”就无从谈起。进一步说，以科学理性精神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对超验世界的解构，似乎就不会削弱以经验世界为根本关注点的中国人的心理基础。但问题显然并没有这么简单。一方面，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由西方肇始并主导；另一方面，现代化在物质层面的表现也必将影响到意识层面。因此，西方人面临的“去神圣化”中国无疑也将会遭遇。只不过西方表现为理念之覆、上帝之死，而中国的表现是信仰缺失与价值虚无。尽管中国主流价值中并无上帝，但尼采笔下的上帝，其实是符号化的最高价值载体。“上帝死了”在中国意味着，当代中国在传统价值伦理颠覆之后，同样面临着西方的信仰缺失与价值虚无。正是由于这个现代性问题无法回避，现实中才出现了所谓的“丧文化”“佛系青年”“空心病”等价值虚无主义的难题。尤其对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旧价值被打碎之后，如何尽快建立新价值，迫在眉睫。新旧价值之间的断裂，使得价值的多元性、矛盾性、不稳定性问题凸显，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价值虚无、信仰危机的最现实表征。

## 二、共产主义的两重维度：人性复归与现实运动

深刻把握信仰的理想与现实的历史辩证性、实践性、人民性是破解中国当前信

仰困境的主要线索。也就是说，当代中国需要建构的核心价值载体既不能只是空洞的崇高，因为那样只会重新回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同时，这种核心价值载体亦不能只是低级的世俗，因为这样又会导致终极意义的缺失。简言之，这种价值载体必然是兼具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既关注当下又指向长远，亦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

### （一）作为远大理想的共产主义

在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语境当中，共产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也是凝聚党心民心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路明灯，而这种表述体现的恰恰就是理想必须具有终极意义和终极关怀。第一，共产主义的理想性即崇高维度首先体现在自然分工的消失，其美好愿景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sup>①</sup> 马克思对此有过十分精彩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sup>②</sup> 也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的这种美好、崇高的理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选择抛头颅、洒热血，将个人发展与人类解放事业结合起来，新中国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第二，共产主义的理想性即崇高维度还体现在人类的解放是真正的解放，即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实现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sup>③</sup> 这种发展状况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阶级对立。与此同时，由于这种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也就是说不仅把人作为手段，更把人作为目的，因此也是人性的真正解放和合乎历史规律的人性复归。<sup>④</sup>

不难看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崇高维度的论述，是以人的自由解放为核心的，也可以说，人的自由解放是共产主义的本质追求。实际上，马克思早在青年时期便立志为了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倾尽所有地努力工作，坚定信念“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sup>⑤</sup>。时至今日，社会现实已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迥然不同，但也出现了科技异化、消费异化、人性异化、权力异化等等新的表现形式，人的智力、体力、能力、个性、兴趣的全面自由发展依然不充分，人的独立自主、自由创造、自我实现依然路漫漫其修远兮，这更加彰显出共产主义学说对人类占有自我本质，获得自由解放，成为完整的人的理想烛照意义。

### （二）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首先，共产主义不仅仅是理想中未来社会所应达成的目标状态，它也是一种现实的运动，是一个不断变革当下的实践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过程。许多人将共产主义固化于未来某一时时间点的完美状态，对其理解多围绕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不断涌流、生产资料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占有、实现按需分配、社会成员拥有良善的道德品质并达到极高的精神境界等阶段性特征。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运动，这种现实运动以消灭资产阶级导致人类不平等的现存状况为前提，因此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应当确立的状况”或“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sup>①</sup> 如果只是这样，那么就又重新回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之中了。从历史发展的走向来看，马克思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未到来，但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早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从马克思、恩格斯改组、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始，共产主义运动就已发轫，虽然遭遇艰难曲折，但其历史发展趋势不可阻挡。

在中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并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如今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产主义运动正在以人们可视、可触、可感的形态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sup>②</sup> 可以看到，共产主义运动切切实实地发生在人们的生活中，共产主义因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孕育、聚积、生长、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当下的实践，是理想的现实化，它存在于未来更属于脚下，可望亦可及。其次，虽然共产主义诉诸终极意义，但其指向的不是神秘的场所，其依靠的不是抽象的力量，恰恰相反，实现共产主义的基础是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这也是共产主义区别于并高于宗教的根本所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思想家罗蒂认为《共产党宣言》比《圣经》的《新约》更值得向年轻人推荐阅读，因为前者依靠非神秘的力量改变世界，而后者依靠神秘的上帝。孰优孰劣，毋庸赘言。

回到马克思，我们发现，共产主义的科学性论证也恰恰在于，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基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考察，以及劳动者作为生产力诸要素中的最活跃的能动的构成部分，将人民群众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视人民群众为历史的创造者。与此同时，马克思主张，要将现实的非神秘力量，通过有组织的联合活动即阶级斗争，进而实现对现存世界的革命化，它是一种长期且复杂的历史性的“生成运动”，而不是一朝一夕便可以完成的，即“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sup>③</sup> 出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拜金主义价值观严重侵蚀着人们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严重扭曲，异化现象一定程度依然存在，此时，人们更加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载体破解精神世界的难题，带领人们克服信仰缺失的危机，走出虚无主义的阴霾。如此一来，就不

---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

②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6页。

难理解为什么当代中国需要建构以“三个倡导”为具体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背后，其终极意义的支撑，与共产主义科学理论并不矛盾，甚至内在契合。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结合也好，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也好，其逻辑进路本质上无疑是相通的，那就是依托现实，实现理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关于这个道理，马克思的解读略显抽象，但思辨背后所预言的是真正的历史进程，亦是共产主义对人自身二律背反的和解：“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sup>①</sup>

### 三、价值虚无的积极应对：正本清源与重建崇高

当前，对于共产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误解。有人认为，共产主义根本不会实现，与乌托邦无异；有人认为共产主义在革命年代具有指导意义，但在现代社会已经过时；还有人索性对共产主义嗤之以鼻，或轻视或调侃。正本清源对待共产主义，不仅有助于澄清理论本身的误解，同时对于坚定理想信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正本清源对待共产主义

不少人鼓吹共产主义过时论、虚无论，对共产主义理论表现出极大的轻视，或者觉得共产主义属于遥远的未来，与自己无甚关联；或是以消极悲观、静态片面的眼光看待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以及当前改革矛盾凸显的现实；亦或是基于对人性的深深怀疑，加之无知臆测、以讹传讹、人云亦云、恶意中伤的发酵，以致于一旦说起共产主义学说，他们便不免断言共产主义不过是“乌托邦之梦”，马克思对未来的想法过于“天真”“荒谬和不切实际”。<sup>②</sup>

与上述无知的轻视不同的是，一些著名学者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则极为看重。海德格尔从存在论的高度如是评价到：“人们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据，但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看来，确定不移的是，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谁若把‘共产主义’认为只是‘党派’或只是‘世界观’，他就是像那些把‘美国制度’只认为而且还加以贬谪地认为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人一样以同样的方式想得太短浅了。”<sup>③</sup>海德格尔是深刻的，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要具有存在论高度和历史性视野，否则就会发出这样粗浅的疑问：“你们那个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里也有交通事故吗？”<sup>④</sup>

撇开哲学思辨，即便是回到现实，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一些西方学者依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7页。

②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③《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84页。

④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第68页。

然极为重视共产主义学说及其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刻洞见。德里达坦言，他挑了一个“好时候”向马克思致敬；亚当·沙夫果断宣称，他依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重复了萨特的话，“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吉登斯指出，虽然不再“时髦”，但他仍“看重”马克思。<sup>①</sup>甚至西方一些顶尖高等学府，均无一例外地选择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青年学生的必读书目。所以，正本清源地对待共产主义学说，真正回到共产主义学说本身、从源头上准确把握共产主义，在当下变得尤为必要和紧迫。同时注意，要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因为共产主义学说以马克思主义逻辑体系为构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就多次强调读原著的重要意义，并尤其呼吁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读经典、悟原理不仅应当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还要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力量提升思想境界，进而指导社会实践。并且，要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阶段性过程来理解，辩证看待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对待共产主义学说，要采用理性探求的方式，避免浅薄、片面的视点，避免道听途说、口耳之学，这是破除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的偏见、牢固建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关键。

## （二）反思理性重建崇高维度

破解现代人的精神世界难题，决不能只是回到传统形而上学的旧路上，因为历史早已多次证明，重建乌托邦无济于事。现代性的复杂之处恰恰在于，既要崇高，还要有其现实基础；既要反思理性，还要依靠理性。由此看来，纯粹的感性信仰如宗教或偶像崇拜，以此应对精神世界难题最不牢靠。因为宗教信仰在我国并没有生发的文化基础，并且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对超验的上帝和神灵的信仰正无可避免地遭遇解构；而偶像崇拜则更多带有盲目、盲从、完美化的特征，极有可能带来认知封闭和自我人格丧失。

同时，权力崇拜、资本崇拜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和合规律性，但由于缺少终极关怀，也势必无法真正达成内心的安定与和解。因为基于功利的权力崇拜或资本崇拜是将自我置身于被奴役的地位，主体或是处在被推动、被牵制的无可奈何境地，或是陷入被压迫而不自知的自我迷失局面，并且权力和金钱标杆的导向作用会使社会成员不能随其兴趣与能力，各尽其才、各有所成。统一化的标准将会扼杀社会的勃勃生机。只有基于工具理性的反思，重建一种价值理性，将个人价值实现与国家、社会的发现紧密契合，才能真正发挥持久、正确的引领作用。依靠理性反思将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的信仰，则是充分尊重人的理性智慧与自我独立性的体现，它能促动社会成员深入思考当下现实与未来的走向，将信仰建立在切切实实的体验之上使之具有信服力，把信仰作为迈向现实中美好未来的指明灯，使之成为变革当下的驱动力，为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服务与奋斗。换句时髦的话说，

---

<sup>①</sup>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前言。

“信曾哥”“信春哥”都不能“永生”，要通过自身的理性深刻反思，通过对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认，依靠现实的力量改变世界，方能获得内心安定和精神恒定。这种现实的力量就是“现实的人”，它是历史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奥秘所在。马克思从经验视野出发进一步解释说，“现实的人”决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sup>①</sup>这一前提性的确证恰恰体现了马克思哲学观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差别。简单说，就是将现实的运动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出发点，还是将“上帝”“理念”“绝对精神”等思辨的抽象作为出发点。马克思的着眼点不是主观臆想出来的，而是真真切切地从感性经验、现实世界出发，“因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sup>②</sup>这个逻辑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群众史观、唯物史观。

### （三）核心价值应对价值虚无

人作为会思想的存在，因为外在环境与自身的流变性，常常会叩问：“我是谁？”“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要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随着超感性世界的崩塌，原本统一完整的信仰世界裂变为价值多元乃至价值虚无。这种价值虚无主义会带来迷茫、痛苦甚至是危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破解价值虚无化，并填补其后出现的信仰真空地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构建，并非一朝而成，它汲取了历史与当代、国内与国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多种思想资源的精华，加以批判甄别、去粗取精而成。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探索，比如毛泽东时期就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sup>③</sup>。如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提出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指明了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规约，并以此构建起新时代的发展方向。提出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艰巨、复杂且长期的历史过程，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更是需要国家、社会和全体成员共同努力，凝聚共识，最终构筑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思想堡垒。

一方面，核心价值的培育和践行要巩固主流并重建崇高。在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碎之后，多元价值并存的情况下，必须凝聚起全体社会成员的信念与力量。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sup>④</sup>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中国精神便以不同阶段、不同形态得以凝聚，并对革命、改革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引领。从建党早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再到大家耳熟能详的“长征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52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3页。

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页。

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以及“雷锋精神”，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特区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无不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中华民族意志品质的集中体现，同时又不断激励和感召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开拓进取。

另一方面，价值、理想、信念、梦想不是奢谈，而必须基于一定的物质保障和前提，必须通过持续不懈的践行与艰苦卓绝的奋斗。不同历史阶段产生了不同形态的中国精神，而中国精神在神州大地的各个区域又呈现出不同的具体样态。譬如，中国精神在江苏就至少表现为雨花英烈精神、周恩来精神、淮海战役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四千四万精神以及王继才精神等等，这既是对江苏革命、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精神概括和提炼，同时反过来又能够对实现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提供精神养分和价值引领。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当然，这个价值目标的实现，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sup>①</sup>

## Thought on Communism's Great Ideal in the New Era

### —Also on the Resolu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urrent Belief Crisis and Value Nihilism

TANG Zhongbao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Abstract:** With the concept of “death of God” and its value subversion since modern times, the belief crisis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commodity fetishism”. Belief cris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urse of modernity. The “dual nature” of modernity has led utilitarianism and pragmatism to control the “core” of the belief world in the form of the highest object of ideology. The belief after value reconstruction must profoundly grasp the unity of ideals and reality in historical dialectics, practicality and humanity. In Marx's view, communism is both a realistic movement and an ambitious ideal; it is both a social stage and a value goal. Marx's theory of communism has a strong pertinence to deal with the current belief crisis and value nihilism.

**Key words:** communism, ambitious ideal, belief crisis, value nihilism

(责任编辑 鲁 焯, 陈金刚)

---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15 页。